

以分配换增长： 早期绩效、后期约束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朱诗娥¹ 杨汝岱²

摘要 “高投资，低消费，创新不足，经济增速显著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点。本文认为，通过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压低劳动回报的以分配换增长模式，塑造了中国经济现有的发展特征。早期，通过压低工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利润份额和总储蓄率，从而强化投资与资本积累，形成“投资拉动型增长”；资本深化加快、产出水平迅速上升，经济更快向稳态收敛。当发展阶段接近技术前沿后，持续增长的核心由资本积累转向技术进步。此时，低工资会直接降低企业创新收益（劳动越便宜，创新回报越低），也会通过压低居民消费与有效需求缩小市场规模，使得固定成本难以摊薄，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以分配换增长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追赶阶段普遍采取的一类发展模式。为此，本文构建一个两阶段理论框架，分析收入分配、资本积累、需求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跨国经验证据和中国发展实践说明，劳动收入份额、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与长期效率表现之间存在与本文理论一致的结构性关系。低工资发展模式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其在模仿追赶阶段可以加速增长，但在创新发展阶段会通过“低工资-低消费-小市场-低创新”的渠道制约长期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压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以分配换增长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未来需要推动宏观经济政策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转型，提高居民收入，以需求引领供给端优胜劣汰和创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 以分配换增长；投资拉动；创新发展；市场规模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内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逐步形成了高投资、低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偏低以及增长动能转换困难并存的结构特征。早期，这一增长模式曾有力支撑工业化、资本积累和产出扩张。但随着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外需环境变化以及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和内需，这种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日益显现。如

^{*}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促进产业升级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协同发展研究”（22BJL09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保障研究”（24ZDA060）的资助。

¹ 朱诗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E-mail: 4239@cueb.edu.cn。

² 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E-mail: rdyang@pku.edu.cn。

何理解这一增长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进而解释中国为何在早期取得显著增长绩效,而在后期又面临创新不足和需求偏弱的双重约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将这种通过压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利润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来推动增长的资本偏向型发展逻辑,概括为“以分配换增长”。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都曾采用的战略。对于资本稀缺、工业能力不足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收入分配向资本一侧倾斜(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伍山林,2011),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储蓄率、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从而有更快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模式是否能够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持续有效,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解释的问题。现有文献对分配、积累、消费和创新等问题研究很多,但相对缺乏一个能够将这些变量统一起来并区分不同发展阶段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

从已有文献看,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关于经济起飞与资本积累的研究,强调收入分配结构对工业化和投资扩张的重要作用。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条件下,现代工业部门能够以较低工资吸纳劳动力,企业劳动力成本很低,企业利润的再投资则推动资本积累和工业扩张。Kaldor的研究进一步从分配-储蓄关系出发,发现不同收入主体具有不同的储蓄倾向,企业的储蓄倾向会高于劳动者的储蓄倾向,当利润份额上升时,社会总体储蓄率往往提高,从而有利于投资增长。这一类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较低劳动回报条件下实现较快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推进。第二,关于长期增长与创新驱动的研究,强调当经济逐步接近技术前沿后,技术进步而非资本深化成为增长的决定性力量。Solow(1957)很早就发现,决定稳态经济增长速度的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以Romer(1990)、Lucas(1988)、Aghion and Howitt(1992)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持续增长来自技术进步和创造性破坏。当模仿空间缩小时,研发投入和创新激励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一种能够在早期促进资本积累的分配结构,并不必然能够在后期继续支持长期增长。换言之,工业化和追赶阶段的有效增长机制,与创新驱动阶段的有效增长机制,可能并不相同。第三,关于技术进步方向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则为理解工资、市场规模与创新激励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进一步基础。Acemoglu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的方向并非外生给定,当劳动相对昂贵时,企业更有动力发展节约劳动的技术。与此同时,创新活动通常需要较高固定成本,其收益实现又依赖市场容量。由此,劳动回报不仅影响成本端的技术替代激励,也会通过居民消费能力影响需求端的市场规模。若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偏低,则一方面企业缺乏足够动力以技术替代劳动,另一方面市场规模扩张受限,创新活动也会被抑制。现有文献虽然分别讨论了上述机制,但对低劳动回报为何在早期有利于增长,却在后期抑制创新这一阶段性转换问题,仍缺少统一解释。

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样本(刘伟等,2004;马建堂,201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高投资、高积累和快速工业扩张,取得了很好的增长绩效,以分配换增长在工业化早期确有现实有效性。但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形成了高投资、低消费和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结构性特点。随着资本边际收益下降、创新和内需对增长的重要性上升,这一结构的约束开始集中显现,表现为现阶段的需求不足、结构性过剩、创新激励偏弱和增长动能转换困难。正因如此,研究中国发展实践的意义在于它较完整地经历了从工业化追赶到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因此更清楚地展现了同一种增长模式在

不同阶段的不同后果。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收入分配视角出发,构建一个关于“以分配促增长”阶段性效应的统一分析框架。核心观点是:压低劳动回报在工业化和追赶阶段能够通过提高利润份额、储蓄率和投资率促进资本积累,从而提升增长绩效;但当经济发展到更接近技术前沿、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和内需时,持续压低劳动回报则会通过削弱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激励、压缩居民消费和市场规模,转而制约企业研发投入和长期增长。因此,“以分配换增长”并不是一种在任何阶段都有效或无效的静态模式,而是一种具有明确阶段边界的发展安排。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将收入分配、资本积累、需求结构与技术进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解释低劳动回报何以在早期促进增长,又何以在后期形成增长约束。第二,本文将成本端的技术替代激励与需求端的创新回报条件统一起来,强调市场规模在增长模式转换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未来宏观政策由供给侧向需求侧转型的重要意义。第三,本文结合跨国证据、中国发展事实与企业微观数据,对上述阶段性机制进行经验检验,力图在一般发展逻辑与中国现实之间建立更清晰的对应关系。

1 制度与社会背景

增长与分配是经济学研究最核心的两个主题,也是现实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两类问题。图1所展示的公元1—2020年全球人均GDP变化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低水平停滞状态,真正持续的增长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中,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研究重心集中于“财富如何实现持续增长”。此后两百多年间,全球经济发展的主线大体建立在劳动与资本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基础之上,这一模式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但它从来不是一个只有效率而没有代价的过程。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在推动增长的同时,也持续重塑着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看,图2是1950年以来各国对数人均GDP方差,图3是1963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这两幅图说明,现代增长并不是一个所有人均等受益的过程,而始终伴随着显著的国家间与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分化。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从来不只是增长,还有“增长成果如何分配”、增长与分配如何协调。增长与分配不仅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主线,也共同塑造了各国现实中的发展战略选择。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采取了以分配换发展的模式,通过压低劳动回报、提高利润份额、强化储蓄和资本积累来实现追赶式增长;一些国家则更强调收入改善、福利扩张与内需培育,希望通过更均衡的分配支撑更稳定的市场规模和社会整合;还有一些国家则在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二者之间的权重,在“增长优先”与“分配优化”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不仅因为发展成果应当更广泛地被社会成员共享,分配本身具有重要的公平价值,也因为在一个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消费需求、市场规模和创新激励的经济体系中,合理分配本身就是增长条件的一部分。换言之,未来分配之所以会越来越重要,不只是因为增长之后要讲公平,也是因为没有更合理的分配,就难以形成更好的增长。本文所讨论的“以分配换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一长期历史背景下形成、演化并逐步显现其阶段性边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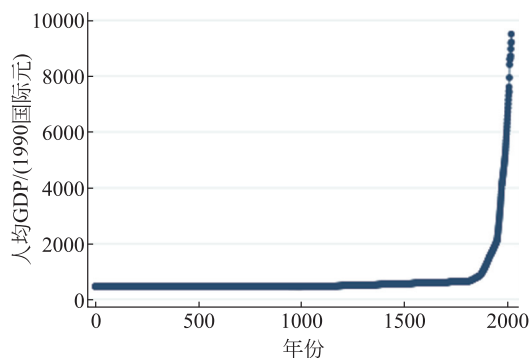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人均GDP/(1990国际元)(1—2020年)

数据来源：1—2008年数据来自Maddison数据库，

2008—2020年数据来自PWT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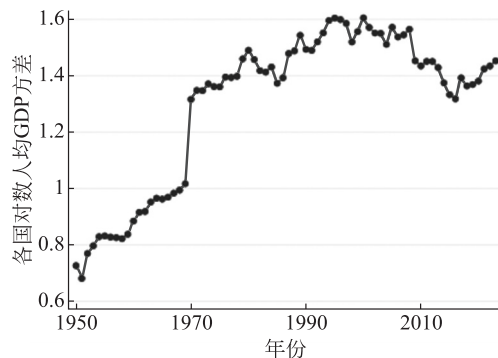


图2 各国对数人均GDP方差(1950—2023年)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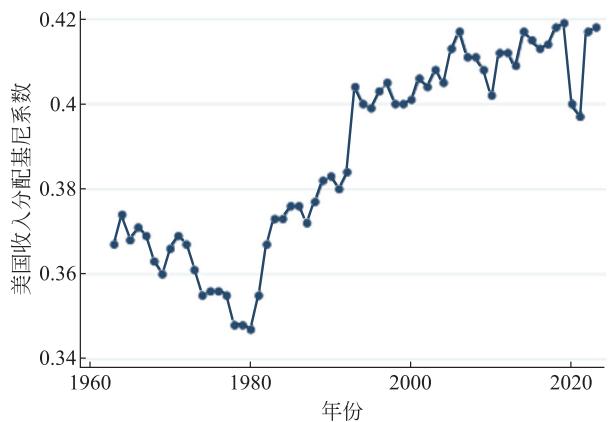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1963—2023年)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1 发展中国家为何普遍倾向于“以分配换增长”

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初期最突出的约束往往不是消费不足，而是资本稀缺、工业基础薄弱。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是尽快形成资本积累能力、扩大工业投资，而不是改善分配。“以分配换增长”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具有现实吸引力的一种模式选择。

这一模式之所以具有普遍性，首先在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严峻的资本形成约束。相较于已工业化国家，它们在现代产业、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和城市化建设方面通常存在较大投资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国家往往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在资本收入更易转化为储蓄和投资的条件下，压低劳动报酬、提高利润份额，便成为一种能够较快增强积累能力的现实路径。其次，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参与国际竞争时，往往依赖低成本优势进入全球市场。无论是出口导向工业化，还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张，都

在相当程度上要求工资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对政府而言,较低劳动成本不仅意味着企业利润率更高,也意味着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由此,较低工资和较差福利安排常常被视为有利于增长的制度条件,而不是增长障碍。最后,在国家能力有限、财政资源相对紧张的条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把公共资源优先配置给能够直接扩大产出能力的部门,而不是优先用于居民福利和消费支持。在增长优先的逻辑下,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投资、出口部门扶持和城市化扩张通常被赋予更高政策优先级,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居民收入支持则相对靠后。结果是,收入分配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和要素配置结构往往共同指向一种偏重资本形成的发展模式。

因此,“以分配换增长”并不是某个国家的偶然政策偏好,而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追赶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类典型发展模式。其根源并不只是单一政策选择,而是资本稀缺、国际竞争压力、国家能力约束和增长优先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1.2 “以分配换增长”的制度实现方式

“以分配促增长”并不是一句抽象口号,而是需要通过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政策机制加以实现。不同国家的制度细节可能并不相同,但从发展实践看,这一模式大体通过以下几类机制落地。第一,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压低劳动回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裕。这一供给条件为低工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或者劳动保护执行不充分,那么劳动者议价能力会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工资增长长期滞后于资本积累和工业扩张速度。其结果是,劳动收入份额更容易被压低,而利润份额则相应提高。第二,通过财政与金融配置强化资本形成导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和金融资源配置都呈现明显的投资偏向。政府往往更倾向于支持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出口行业 and 重点制造业项目,而不是优先支持居民福利、公共服务和家庭部门收入改善。银行体系、开发性金融、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也通常更偏向资本形成和企业扩张。由此,资本可以持续获得相对廉价和稳定的资源支持,而居民部门则缺乏足够的收入与福利支撑,最终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组合。第三,通过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安排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晚、覆盖有限,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者在城乡、地区和部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样一来,劳动力进入工业和城市部门,并不一定同步获得充分的社会福利保障。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劳动成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未通过工资和福利充分体现;对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其实际保障水平和议价能力受到抑制。结果是,低工资制度可以在更长时期内被维持。第四,通过出口导向和全球市场吸纳缓解内需不足约束。如果是一个封闭经济,低工资会带来低消费,经济体无法长期维持一个供需不匹配的结构。但在开放条件下,低工资、高积累和出口扩张往往相互强化。对于国内消费能力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部市场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吸纳其不断扩张的工业产能,从而使“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结构得以维持。也就是说,外需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低消费结构的内在约束显现。

总体而言,“以分配换增长”并不是由某一项单独政策构成的,而是劳动力市场制度、财政金融配置、福利安排、出口结构和国家发展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在这些制度机

制的相互配合下,一种偏向资本积累、相对压低劳动回报的发展结构才能长期维持。

1.3 中国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

“以分配换增长”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追赶过程中都曾面临的一种模式选择,中国就是典型案例。几十年来,中国以更大规模、更长时期和更系统化的方式体现了这一模式的形成、成功与约束。很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模式做了很多的探讨(蔡昉和王德文,1999;刘伟等,2004;马建堂,2018;伍山林和毕鹏飞,2025)。

首先,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具备极其充裕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为工业部门和出口制造业提供了持续而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源(郭克莎,2004)。这种劳动力供给条件,使中国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较低工资水平,并迅速扩张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工业化推进能力(邓宏图等,2018)。其次,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上具有更强的制度性压低劳动成本空间。户籍制度、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以及不完全的公共服务覆盖,使劳动力虽然实现了大规模流动,却并未在统一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条件下实现完全流动。其结果是,大量劳动者进入工业和城市部门,却未同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使中国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较低劳动成本和较低劳动收入份额(伍山林,2011)。最后,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地方政府激励体系对投资和资本形成具有极强偏向。地方政府长期围绕增长目标展开竞争,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和招商引资构成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与此同时,金融资源配置、税收优惠和产业政策安排也在很大程度上偏向资本形成、制造业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中国不仅形成了较高投资率,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支持资本积累的发展治理结构。此外,中国在全球化时期恰好抓住了外需扩张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机遇(张燕生,1990;张幼文,2015)。低工资、高积累和出口导向相互强化,使中国在较长时期内能够将内需不足的问题部分外部化(汪伟等,2013)。换言之,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维持,与全球市场对中国产能的吸纳能力密切相关(张莉等,2012)。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路径较完整地跨越了从低收入工业化到中等收入追赶再到创新驱动转型的阶段,因此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同一种发展模式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后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只经历了早期工业化而尚未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因此其模式约束尚未充分显现。而中国已经在较大程度上进入增长方式转换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模式所带来的需求不足、结构性过剩和创新激励偏弱等问题也因此表现得更加集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验不仅具有个案价值,也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的阶段转换提供了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对象。

2 理论框架

本文试图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压低劳动报酬、提高利润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促进增长,而在后期却会转化为长期增长约束。由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收入分配、资本积累、消费需求与技术进步的两阶段理论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思想是,收入分配结构不仅影响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影响市场规模与创新激

励;而不同发展阶段的增长动力并不相同,因此同一种分配结构会在不同阶段产生不同增长结果。具体来说,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在现实经济中,劳动者和企业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往往存在明显差异。一般而言,劳动收入更多用于消费,而资本收入中较大比例会被用于储蓄和投资。因此,当收入分配向资本一方倾斜时,社会整体储蓄率往往会上升。第二,创新的收益不仅取决于技术替代劳动的供给侧成本优势,还取决于需求侧市场规模。创新往往需要较高的研发投入与固定成本,企业只有在市场规模足够大时才有动力进行创新。因此,市场规模将直接影响创新活动的回报。在这一框架下,资本-劳动收入分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利润份额上升,从而提高社会储蓄率与投资率,促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也会压低居民消费水平,从而缩小市场规模并降低创新回报。因此,分配结构既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技术进步,而这两种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2.1 模型基本设定

设经济中存在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两类主体。劳动者主要获得工资收入,资本所有者主要获得利润收入。两类主体的消费与储蓄行为存在差异,劳动收入中较大部分被用于消费,而利润收入中较大部分被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基于标准的 Solow(1957)模型框架,考虑一个封闭经济,最终产品部门使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进行生产。设总产出函数为:

$$Y_t = A_t K_t^\alpha L_t^{1-\alpha}, \quad 0 < \alpha < 1 \quad (1)$$

其中, Y_t 表示 t 期总产出, A_t 表示技术水平, K_t 表示资本存量, L_t 表示劳动投入。为简化分析,假设劳动力供给外生给定,并标准化 $L_t = 1$ 。则生产函数可以写为:

$$Y_t = A_t K_t^\alpha$$

本文关注压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以分配换增长发展模式对增长的影响。为刻画这种分配结构,设劳动收入份额为 $\theta_t \in (0, 1)$, 当期收入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分配。 $W_t = \theta_t Y_t$ 为劳动收入总额, $\Pi_t = (1 - \theta_t) Y_t$ 为资本收入总额。资本偏向型的发展模式意味着 θ_t 被压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

2.2 储蓄与投资

为了分析收入分配如何影响资本积累,假定劳动者与企业具有不同的储蓄倾向。设劳动者的储蓄率为 s_L , 企业的储蓄率为 s_K , 并假定 $s_K > s_L$ 。于是,社会总储蓄为 $S_t = s_L W_t + s_K \Pi_t$, 代入可得到总储蓄率: $s(\theta_t) = \frac{S_t}{Y_t} = s_L \theta_t + s_K (1 - \theta_t) = s_K - (s_K - s_L) \theta_t$ 。于是有:

$$\frac{ds(\theta_t)}{d(\theta_t)} = -(s_K - s_L) < 0 \quad (2)$$

这表明,当劳动收入份额 θ 下降时,社会总储蓄率 s 上升。低工资政策通过提高利润份额,扩大了资本积累的资源来源。

再来看资本存量的动态积累方程:

$$K_{t+1} = (1 - \delta) K_t + S_t = (1 - \delta) K_t + s(\theta_t) A_t K_t^\alpha \quad (3)$$

其中, δ 为折旧率, $0 < \delta < 1$ 。

根据模型的基本设定, 可以看到, 劳动收入份额越高, 居民消费能力越强, 国内市场规模越大。这是本文后续分析创新活动的关键。创新不仅取决于供给侧的成本替代收益, 也取决于需求侧是否存在足够大的市场来覆盖研发投入和固定成本。在增长动力方面, 本文区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驱动阶段, 此时经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 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深化、产业扩张和技术模仿。第二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 此时经济逐步接近技术前沿, 资本深化的边际作用下降, 持续增长越来越依赖企业研发和技术进步。由此, 收入分配结构对增长的影响机制也将发生变化。

2.3 第一阶段均衡: 资本驱动阶段中的“以分配换增长”

在前述基本模型设定下, 我们来讨论第一阶段的均衡。经济起飞阶段, 资本存量还非常低, 离技术前沿也还非常远, 政策目标主要是要加速资本积累。这时候假设技术进步外生, 模仿型发展, 可模仿到接近技术前沿, 此时的技术进步不需要投入。 $A_t = \bar{A}$, $g_A = \frac{A_{t+1} - A_t}{A_t}$, g_A 外生, 且不受 θ 影响。式(3)可以表示为:

$$K_{t+1} = (1 - \delta)K_t + s(\theta)Y_t = (1 - \delta)K_t + s(\theta)\bar{A}K_t^\alpha$$

当劳动收入份额 θ 下降时, $s(\theta)$ 上升, $s(\theta)\bar{A}K^\alpha$ 上升, $\dot{K} = s(\theta)\bar{A}K^\alpha - \delta K$ 上升, 均衡的资本存量 $K^*(\theta) = \left(\frac{s(\theta)\bar{A}}{\delta}\right)^{\frac{1}{1-\alpha}}$ 上升。

由此可见, 在技术水平外生给定的条件下, 劳动收入份额越低, 总储蓄率越高, 这会使得均衡资本存量 K^* 上升、均衡产出 Y^* 上升、资本积累速度 $\dot{K}$ 上升。也就是说, 在资本稀缺的发展初期, 低工资发展模式可以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 推动经济更快实现资本深化与产出扩张。需要注意的是, 在收敛到稳态的过程中, $\dot{K}$ 上升, 收敛的速度更快, 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 但经济达到稳态时, K^*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增长速度不变, 仍然与技术进步速度 g_A 一致。也就是说, 资本积累只有水平效应, 不能带来均衡的持续的增长率上升。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 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 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时, 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就必然要从投资拉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转型。

结论 1(模仿型发展阶段, 压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政策可以加速资本积累, 促进经济增长): 当处于技术水平较低的模仿型发展阶段时, 若企业的储蓄率高于劳动者, 即 $s_K > s_L$, 则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会提高社会总储蓄率, 投资曲线上移, 资本积累速度加快, 并提高稳态资本与产出水平, 从而加快经济向稳态收敛。这一结论说明, 早期增长中“低劳动收入份额-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组合并非偶然, 而是具有内一致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会普遍采取偏向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

$$\theta_t \downarrow \Rightarrow s(\theta_t) \uparrow \Rightarrow K_{t+1} - K_t \uparrow \quad (4)$$

2.4 第二阶段均衡: 创新驱动阶段中的增长约束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技术进步可以主要依赖外部引进、模仿和扩散。但当经济逐

步接近技术前沿时,长期增长越来越依赖自主研发与内生创新。本文将技术进步设定为由企业研发投入内生决定。假设技术进步为: $A_{t+1} = (1+g_t)A_t$, g_t 为技术进步速度。进一步假设技术进步速度依赖于研发投入 R_t , $g_t = \phi R_t$, $\phi > 0$ 。

下面考虑企业如何选择研发投入。首先假设技术创新收益只有一个来源:节省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技术提高 1 单位,能节约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节约的劳动成本与工资水平成正比,即研发收益为 $\varphi W_t A_t$ 。用劳动收入份额 θ_t 作为工资水平的代理变量,工资越高,劳动份额越大,单位价值越高。

企业选择研发投入 R_t 以最大化净收益:

$$\max_{R_t \geq 0} \theta_t Y_t \varphi R_t - \frac{\eta}{2} R_t^2 Y_t \quad (5)$$

其中, $\eta > 0$, $\varphi > 0$, 利润函数的第一项为节约劳动成本的收益,第二项为研发成本。一阶条件: $R_t^* = \frac{\theta_t \varphi}{\eta}$ 。此时,技术进步速度为: $g_t = \phi R_t^* = \phi \frac{\theta_t \varphi}{\eta}$, $\frac{\partial g_t}{\partial \theta_t} > 0$ 。可以看到,压低工资(劳动份额 θ_t 下降),会降低均衡的研发投入 R_t^* 与技术进步速度 g_t 。此时的均衡经济增长速度 $g_Y = \frac{1}{1-\alpha} g_A$, 因此, θ 下降, g_A 下降,长期增长速度下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研发投入才能推动技术进步时,如果技术进步可以节约劳动,则工资越低,由技术替代劳动的收益越小,企业就越倾向于用便宜劳动力而不是技术研发节约劳动,从而降低均衡时技术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

2.5 第二阶段均衡:技术进步可以节约劳动,同时受益于市场规模扩大

前面的讨论中,低工资抑制创新的机制只有一个:低工资使得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边际收益不够高,实际上,低工资影响创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渠道:低工资使得消费不足,市场规模小,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分摊创新成本,从而创新不足。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引入消费需求 C ,且 C 和劳动收入份额成正比。此外,假设企业创新收益受市场规模 M 影响,而市场规模由居民总消费水平决定。

设总消费为劳动者消费与企业消费之和,

$$C_t = (1-s_L) W_t + (1-s_K) \Pi_t = [(1-s_L) \theta_t + (1-s_K)(1-\theta_t)] Y_t$$

记平均消费倾向为 $c(\theta_t) = (1-s_L) \theta_t + (1-s_K)(1-\theta_t) = (1-s_K) + (s_K-s_L) \theta_t$, 则有 $C_t = c(\theta_t) Y_t$ 。由于 $s_K > s_L$, 所以, $\frac{dc(\theta)}{d\theta} = s_K - s_L > 0$, 即 θ 下降, C 下降。这说明劳动收入份额越高,消费倾向越高,总消费规模越大;反之,劳动收入份额越低,总消费规模越小。由于居民消费是构成国内市场需求的重要来源,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分配结构向利润倾斜,也意味着有效需求和市场规模受到压缩。这一机制是理解低工资发展模式长期后果的关键。因为在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创新活动不仅依赖成本比较,也依赖创新成果能否在足够大的市场中实现收益。

接下来讨论企业创新决策。这时候,研发收益受市场规模影响,创新成果只有在足够大的市场中销售,才能覆盖研发的固定成本。和前面类似, $A_{t+1} = (1+g_t)A_t$, $g_t = \phi R_t$ 。

企业行为: $\max_{R_t \geq 0} \varphi C_t R_t - \frac{\eta}{2} R_t^2 Y_t$, 利润函数的第一项为企业的创新收益, 其随市场规模扩大而增加, 第二项为研发成本。代入 $C_t = c(\theta_t) Y_t$, 可以得到 $\max_{R_t \geq 0} \varphi c(\theta_t) Y_t R_t - \frac{\eta}{2} R_t^2 Y_t$, 一阶条件为: $\varphi c(\theta_t) - \eta R_t = 0$, 得到 $R_t^* = \frac{\varphi}{\eta} c(\theta_t)$, 则: $g_t = \phi R_t^* = \phi \frac{\varphi}{\eta} c(\theta_t)$ 。由 $\frac{dc(\theta)}{d\theta} > 0$, 可得到 $\frac{\partial g_t}{\partial \theta_t} > 0$ 。因此, θ 下降, $c(\theta)$ 下降, R^* 下降, g_t 下降。这表明, 劳动收入份额越高, 消费规模越大, 创新回报越高, 研发投入越强, 技术进步速度越快。相反, 若长期压低工资与劳动份额, 则会通过压缩消费和市场规模降低创新激励, 进而抑制长期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增长。

结论 2(创新发展阶段, 压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产业政策会抑制创新, 进而抑制经济增长): 如果技术进步可以节约劳动(成本端机制); 如果市场规模越大, 创新收益越大(需求端机制), 则企业创新的边际收益与工资水平成正比。劳动份额 θ 越低, 最优研发投入 R_t^* 越小, 技术进步速度 g_A 越低, 经济长期增长速度越低。

这一结论表明, 早期有助于资本积累的分配结构, 在后期可能转化为创新约束。也就是说, 同一种“低劳动收入份额”安排, 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增长效应: 早期通过投资渠道促进增长, 后期通过创新渠道抑制增长。提高劳动回报并不只是改善分配, 它还可能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和市场容量, 增强企业的创新回报条件。也正因如此, 在创新驱动阶段, 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与技术进步不再是彼此分离的问题, 而是同一增长机制的不同侧面。

$$\theta_t \downarrow \Rightarrow c(\theta_t) \downarrow \Rightarrow R_t^* \downarrow \Rightarrow g_t \downarrow \quad (6)$$

由此可以看到低工资影响创新的两个渠道。首先, 替代劳动的收益。工资低, 创新节约劳动的回报小, 技术进步的吸引力下降, 企业减少研发。此外, 市场规模渠道。低工资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C_t = c(\theta_t) Y_t$], 那么企业生产的产品能获得的市场规模就比较小, 创新收益难以摊薄研发的固定成本, 企业的研发动力下降。总结而言, 在我们模型的假设条件下, 工资水平越低, 劳动收入份额 θ 越小, 创新能替代的单位劳动的价值就越小, 消费需求(市场规模)也越低, 企业的研发动机越小, 越不利于创新。

简要讨论两个阶段如何切换。可以认为有两个触发条件: 资本存量 K_t 和技术水平 A_t 。当 K_t 达到某个阈值 $\bar{K}$ 后, 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 增长开始更依赖于 A_t 。也就是说, $K_t < \bar{K}$ 时, 处于阶段一; 当 $K_t \geq \bar{K}$, 处于阶段二。经济刚开始发展时, 技术水平很低, 此时技术进步不需要太大的投入, 处于阶段一, 当技术进步接近可模仿的前沿后,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继续增长, 进入阶段二。

结论 3(发展阶段切换): 存在资本存量阈值 $\bar{K}$ 和技术水平阈值 $\bar{A}$ 使得低工资政策在阶段一提高增长(通过资本积累), 但在阶段二降低增长速度(通过降低技术进步速度), 形成“早期快速增长, 后期低速增长”的动态均衡。

2.6 小结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将收入分配、资本积累、消费需求与技术进步统一在同一分析框

架中,揭示了以分配换增长模式的阶段性增长机制。研究表明,以分配换增长模式并非在所有阶段都可以达到目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压低工资与劳动份额能够通过提高利润份额和储蓄率强化资本积累,这一机制有助于工业化和快速追赶。然而,当经济由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时,持续压低工资将导致两个后果。其一,企业缺乏足够激励以技术替代劳动;其二,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市场规模收缩,创新活动难以获得足够回报。最终,技术进步速度下降,长期增长潜力受损。这一框架的核心结论不是简单地否定低工资增长模式,而是强调其适用范围具有阶段边界。对处于工业化和追赶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偏向资本积累的分配结构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促进增长;但对已经更接近技术前沿、需要依靠创新和内需支撑增长的经济体而言,继续维持同样的分配结构,则可能从早期增长动力演变为后期增长约束。由此,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不仅在于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更在于重建收入分配、市场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循环。

3 跨国证据与中国实践

这部分从全球和中国发展的实践来讨论压低工资水平的产业政策是否会和理论模型预测的那样,短期内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长期会不利于创新和增长。我们需要从数据上得到支撑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检验劳动收入份额是否与消费率、资本形成率之间存在系统性关系,以对应资本驱动阶段“低劳动份额-高储蓄-高投资”的机制。第二,检验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表现之间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以对应创新驱动阶段“低劳动份额抑制技术进步”的机制。第三,结合中国宏观事实与企业微观数据,考察工资、市场规模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市场规模对创新激励的放大作用。整体上,本节并不追求严格的因果识别,而是试图从跨国结构关系、中国发展历程和企业行为三个层面,检验理论框架所揭示的阶段性机制是否与现实证据相一致。

3.1 跨国经验:劳动收入份额、需求结构与创新表现的阶段性关系

首先考察劳动收入份额与宏观需求结构之间的关系。数据来自 Penn World Table 11.0。所有变量均取 2015—2019 年的均值。后文相关跨国检验图表的数据均做类似处理。图 4 和表 1 的列(1)、(2)显示,在跨国样本中,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与资本形成率显著负相关。以 2015—2019 年均值为样本进行回归,在控制人均 GDP 和技术水平等变量后,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率的回归系数为 0.476,且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资本形成率的回归系数为-0.115,在 5%置信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消费率和更低的投资率;反之,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国家,则更容易呈现出低消费、高投资的结构组合。这一结果与结论 1 高度一致。对于处于工业化和追赶阶段的国家而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不只是一个分配现象,它还意味着利润份额上升、储蓄率提高和资本形成能力增强。由此,较低劳动收入份额往往对应更强的投资扩张倾向。跨国数据显示,以分配换增长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而是一类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普遍性的宏观发展战略。

进一步地,图 5 和表 1 后三列展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表现之间的关系。若直接看全样本,劳动收入份额与 TFP 增速的正相关关系并不稳健;但将样本划分为更接近技术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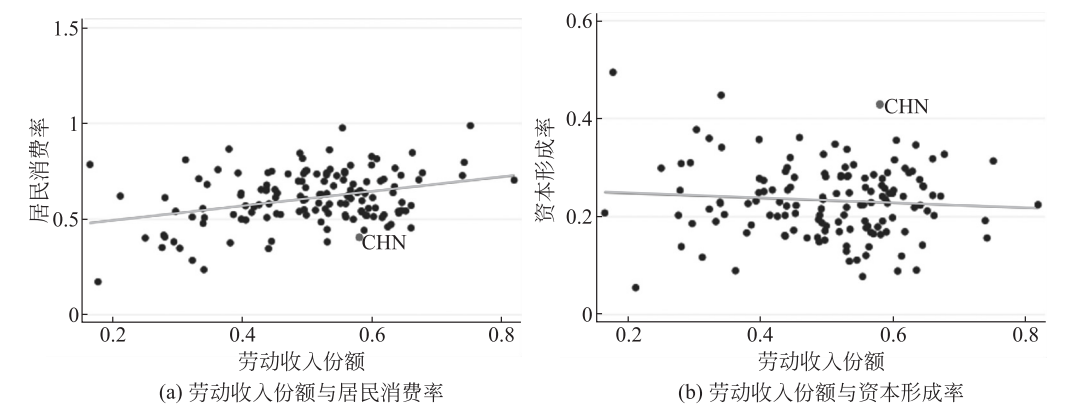


图 4 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跨国证据)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11.0

表 1 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和创新

VARIABLES	(1)	(2)	(3)	(4)	(5)
	居民消费率	资本形成率	TFP 增速	TFP 增速	TFP 增速
劳动收入份额	0.476 *** (0.0840)	-0.115 ** (0.0449)	4.511 (3.057)	9.297 *** (2.493)	1.043 (4.612)
Observations	120	120	120	59	61
R ²	0.575	0.412	0.051	0.328	0.06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控制了人均GDP和技术水平等变量；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11.0，取2015—2019年均值；列(4)样本是离世界技术前沿比较近的国家，列(5)样本是离世界技术前沿比较远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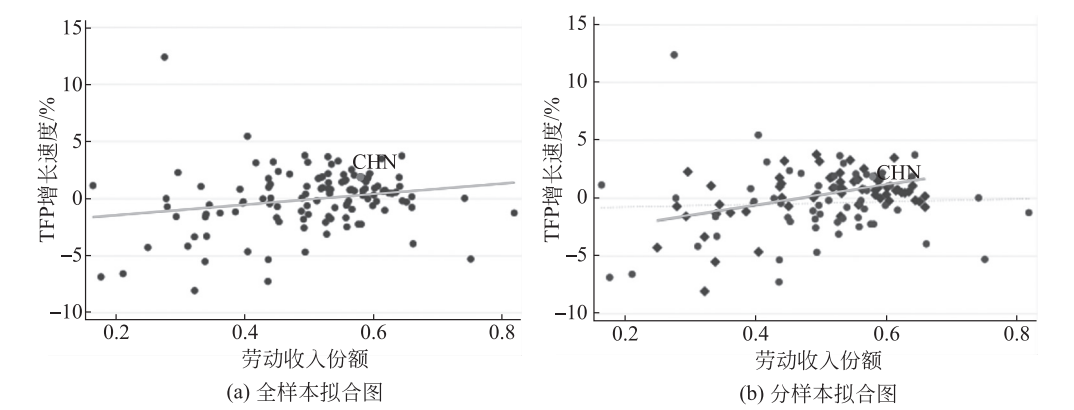


图 5 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11.0

沿和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两组后，这一差异便明显显现出来。表 1 列(4)显示，在更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中，劳动收入份额对 TFP 增速的回归系数为 9.297，且在 1%水平上显著；而列(5)中，在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国家中，系数不显著。图 5 的拟合结果也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出现在更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而在远离技术

前沿的国家中并不明显。图5(b)中,菱形的点表示离技术前沿较近的国家,实线拟合;圆形的点表示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国家,虚线拟合。这一结果与结论2对应。其含义不在于简单地说明高劳动份额一定更有利于创新,而在于说明劳动收入份额对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阶段性。在远离技术前沿的阶段,经济增长仍可较多依赖资本深化、技术模仿和产业扩张,因而劳动收入份额对创新表现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在更接近技术前沿的阶段,增长越来越依赖研发投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此时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居民消费能力和创新回报条件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便显著增强。换言之,跨国证据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判断:同一种偏向资本积累的分配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增长后果。早期它有利于积累,后期却可能约束创新。

上述跨国结果从国际比较角度揭示了与理论一致的事实: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国家往往具有低消费、高投资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不变,而是随发展阶段变化;越接近技术前沿,市场规模与创新回报条件的重要性越强。

3.2 中国实践:从高积累的增长优势到高积累的结构约束

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上述阶段性机制提供了最完整的现实样本。图6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1980年至2010年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约为9.5%;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到年均约5.6%。与这一增长轨迹相对应,图7显示,中国资本形成率持续上升并长期维持高位,居民消费率则持续下降并处于较低水平。到2010年前后,资本形成率达到约46%的高点,而居民消费率降至约35%的低点。与此同时,图8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低水平,且2010年后增速明显下降,说明在资本积累取得显著进展之后,增长的主要约束越来越转向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如果将这些事实放在第三节的理论框架下,中国的发展故事就不是简单的过去增长快、现在增长慢,而是一个典型的阶段转换过程。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国依靠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和出口扩张的结构组合,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长期追赶。这意味着,以分配换增长在中国早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较低劳动成本、较高利润份额、较强储蓄能力、投资导向的金融配置以及地方政府围绕资本形成展开的竞争,共同塑造了一种偏向投资和供给扩张的增长机制。在资本稀缺、工业能力不足、出口空间较大的条件下,这种机制能够快速推进工业化和产能扩张。

中国经验的关键意义,不只是在于它证明了这一路径曾经有效,也在于它揭示了这一模式何以会在后期逐步转化为增长约束。随着资本存量上升、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外需吸纳能力减弱以及经济逐步逼近技术前沿,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内需和效率改善,而不再主要依赖单纯扩张投资。此时,原有增长结构的代价开始集中显现。其一,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意味着国内市场扩张不足,企业创新难以依托足够大的需求基础摊薄固定研发成本。其二,劳动成本长期偏低,削弱了企业以技术替代劳动的激励,使企业更倾向于依赖廉价劳动力而非持续研发。其三,高投资结构在需求支撑不足的情况下,还可能带来更明显的结构性供需失衡和产能压力。

中国实践支持了理论模型中结论3所强调的阶段切换逻辑。在资本驱动阶段,压低劳动回报能够提高积累率并推动快速追赶;但在创新驱动阶段,继续维持同样结构,则会通过压缩消费、缩小市场和弱化创新激励,逐步削弱长期增长潜力。从图6到图8所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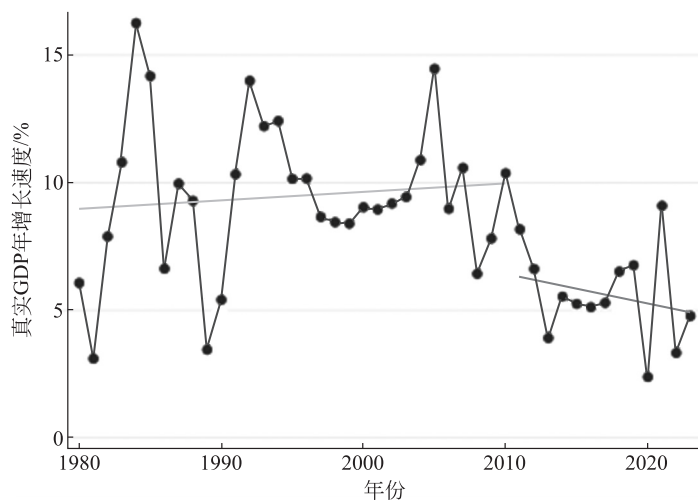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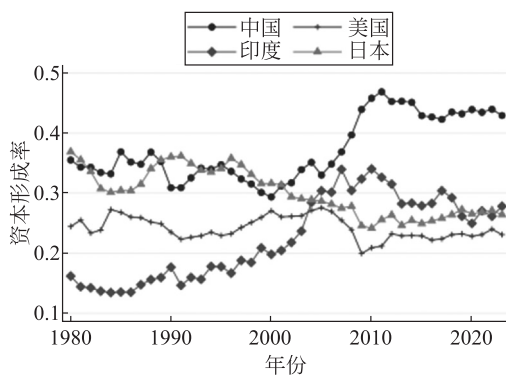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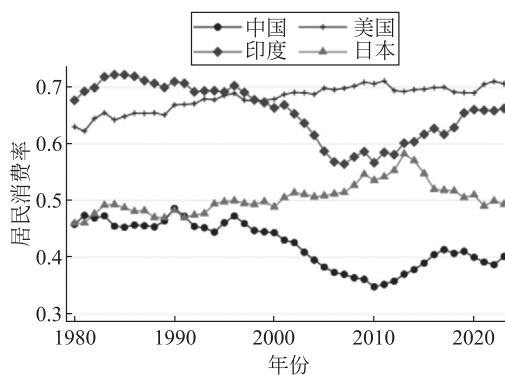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历年GDP增长(1980—2023年)

数据来源: Penn World Table 11.0



(a) 资本形成率



(b) 居民消费率

图7 主要国家资本形成率与居民消费率(1980—2023年)

数据来源: Penn World Table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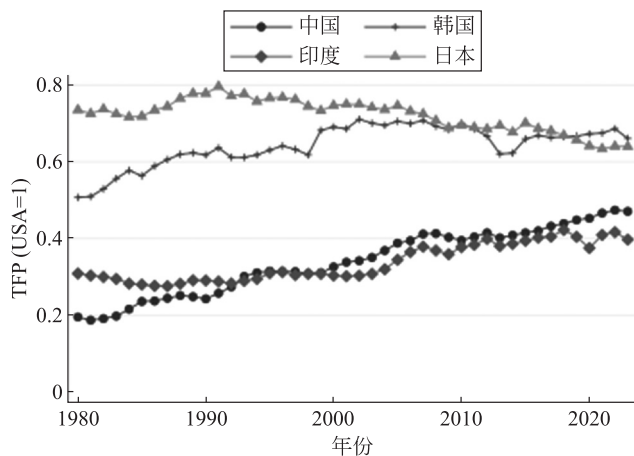


图8 主要国家全要素生产率 TFP(1980—2023年)(USA=1)

数据来源: Penn World Table 11.0

的,不是几个彼此孤立的宏观现象,而是同一增长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连续表现:早期是高积累带来的增长优势,后期则是高积累结构所内生出的增长约束。

宏观结构的阶段性转换,最终需要在企业行为层面得到支撑。表 2 利用 2007—2020 年企业税调数据,对工资水平、劳动收入份额、市场规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被解释变量为研发密度,即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工资份额、人均工资以及企业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加入工资变量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以检验市场规模是否会放大劳动回报对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和工资水平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以工资份额衡量劳动回报时,其系数为 0.038,在 1%水平上显著;以人均工资的对数衡量劳动回报时,其系数分别为 0.041 和 0.016,均在 1%水平上显著。更重要的是,工资变量与市场份额的交互项也显著为正:工资份额与市场份额交互项的系数为 8.604,人均工资与市场份额交互项的系数为 3.475,均高度显著。这意味着,劳动回报越高,企业研发密度越高;而且市场规模越大,这种促进作用越强。

表 2 劳动收入份额、市场规模与创新

	(1)	(2)	(3)	(4)
	研发密度	研发密度	研发密度	研发密度
工资份额	0.038 *** (0.011)			
ln(人均工资)			0.041 *** (0.002)	0.016 *** (0.002)
工资份额 * 市场份额		8.604 *** (1.231)		
ln(人均工资) * 市场份额				3.475 *** (0.174)
Observations	1149712	1200368	1140290	1125934
R ²	0.639	0.636	0.638	0.63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省略了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系数。

这一结果对第三节提出的两个创新机制都构成了直接支持。第一,工资上升会提高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相对收益。劳动越昂贵,企业越有动力通过自动化、工艺改进和研发投入替代劳动,从而提高研发的边际收益。第二,工资上升还意味着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而更大的市场规模又使企业更容易通过产品销售覆盖研发成本并实现创新回报。交互项显著为正,恰恰说明工资与市场规模并不是彼此独立地影响创新,而是相互强化、共同作用于企业研发决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模式转型并不只是宏观层面的消费-投资再平衡问题,更是企业创新激励结构必须发生变化的结果。若劳动回报长期偏低,企业一方面缺乏足够动力以技术替代劳动,另一方面又面临相对有限的市场规模,研发投入自然会受到抑制。相反,提高劳动回报并扩大市场规模,不仅具有改善分配和提升居民福利的意义,也能够直

接增强企业创新激励和长期增长能力。企业层面的回归结果由此将宏观结构变化与微观行为机制联结起来,使本文的阶段性理论获得了更好的经验支撑。

综合跨国证据、中国实践与企业微观结果,可以得到一个较为一致的经验判断。第一,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经济体通常更容易呈现低消费、高投资的结构组合,这支持了资本驱动阶段“以分配换增长”的积累机制。第二,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出现在更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这支持了创新驱动阶段“低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技术进步”的机制。第三,在企业层面,工资水平和工资份额越高,研发投入越多,且市场规模会放大这一作用,这支持了市场规模对创新激励的放大机制。

因此,经验事实整体上与第三节的理论框架高度一致:以分配换增长并非一种在所有阶段都有效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具有明显阶段边界的成长安排。在工业化和追赶阶段,它能够通过提高利润份额、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推动增长;但当经济逐步接近技术前沿、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和内需时,持续压低劳动回报则会通过压缩消费、缩小市场和削弱创新激励,逐步从增长动力转化为增长约束。中国经验最重要的启示,正是在于它较完整地展示了这一阶段转换过程。

4 主要结论与拓展

本文围绕“以分配换增长”这一发展逻辑,分析了收入分配结构如何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资本积累、需求结构和创新激励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压低劳动回报、提高利润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的发展模式,并非在所有阶段都有效,而是一种具有明确阶段边界的发展安排。在工业化和追赶阶段,当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深化、产业扩张和技术模仿时,较低劳动收入份额能够通过提高储蓄率 and 投资率强化资本积累,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当经济逐步接近技术前沿、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和内需时,持续压低劳动回报则会通过削弱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激励、压缩居民消费和市场规模,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和长期增长。换言之,同一种增长模式会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发生效果逆转,早期是增长动力,后期则可能转化为增长约束。

跨国证据、中国实践和企业微观数据整体上支持了这一判断。跨国比较表明,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经济体通常更容易呈现低消费、高投资的结构组合,而劳动收入份额与创新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出现在更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则较完整地展示了这一阶段转换过程。早期,高投资、高积累和快速工业扩张支撑了长期追赶;后期,低消费、需求不足和创新激励偏弱逐步成为增长方式转换中的重要约束。企业层面的证据进一步说明,工资水平和工资份额越高,研发投入越多,且市场规模会显著放大这一作用。由此,本文试图说明,收入分配并不只是一个公平问题,也不仅仅影响当期消费,而是与资本积累能力、市场规模和创新回报共同构成增长模式演变的关键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至少具有三方面政策含义。第一,发展模式的评估必须具有阶段性视角。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脱离具体发展阶段抽象判断某种模式“好”或“不好”,而应考察其是否与当前增长动力相匹配。早期以分配换增长有其现实基础,但当增长越来越依赖创新和内需时,旧模式就必须及时退出。第

二,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不只是简单刺激消费,而是重建收入分配、市场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循环。提高劳动报酬、增强居民收入增长能力、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具有分配与民生意义,也直接关系到创新回报条件和长期增长能力。合理的分配结构不只是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第三,产业政策本身也需要转型。工业化早期偏向资本形成、要素投入和产能扩张的政策安排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产业政策更应着力于改善创新回报环境,促进需求扩张、技术升级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协调,而不是继续单纯强化投资和产能导向。

当然,本文仍存在若干有待进一步深化之处。首先,跨国部分目前更多提供的是结构性和描述性证据,未来可以进一步利用更长时间序列的国家面板数据和更严格的识别策略,对“以分配换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增长效应进行系统检验。其次,中国部分可以进一步结合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数据,识别不同发展阶段下分配结构、需求条件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异质性联系。也可以从企业层面尽量做更详细的因果识别。最后,在理论上,本文构建的是一个相对简化的两阶段框架,未来还可以将开放经济条件、技术前沿追赶过程等纳入统一模型,以更完整地刻画发展模式转换的动态机制。

总体而言,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关于增长模式适用边界的阶段性命题。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当发展阶段已经改变之后,原有模式若不能及时退出,就可能从早期增长优势演变为后期增长障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从供给侧导向向需求侧导向转型,从资本形成导向转向更加重视居民收入、市场规模和创新激励的协调,构成了中国实现增长方式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向。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 2009.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经济研究, 44(3): 27-41.
- Bai C E, Qian Z J. 2009. Fact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the story behind the statistic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4(3): 27-41. (in Chinese)
- 蔡昉,王德文. 1999.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 经济研究, 34(10): 62-68.
- Cai F, Wang D W. 1999.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labor[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4(10): 62-68. (in Chinese)
- 邓宏图,徐宝亮,邹洋. 2018. 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J]. 经济研究, 53(11): 17-31.
- Deng H T, Xu B L, Zou Y. 2018. The economic logic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from heavy industry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3(11): 17-31. (in Chinese)
- 郭克莎. 2004. 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J]. 中国社会科学, (1): 30-41, 205-206.
- Guo K S. 2004.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30-41, 205-206. (in Chinese)
- 林毅夫,刘培林. 2003. 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4): 18-32, 204.
- Lin Y F, Liu P L. 2003. The effect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experienc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18-32, 204. (in Chinese)
- 林毅夫,刘明兴. 2004. 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 经济研究, 39(7): 48-58.
- Lin Y F, Liu M X. 2004.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9(7): 48-58. (in Chinese)
- 刘伟,许宪春,蔡志洲. 2004. 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7): 6-14, 28, 155.
- Liu W, Xu X C, Cai Z Z. 2004. China's economic growth—viewed from the strategy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7): 6-14, 28, 155. (in Chinese)
- 马建堂. 2018. 中国发展战略的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34(10): 2-10, 231.
- Ma J T. 2018.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4(10): 2-10, 231. (in Chinese)
- 汪伟, 郭新强, 艾春荣. 2013. 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J]. 经济研究, 48(11): 100-113.
- Wang W, Guo X Q, Ai C R. 2013.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decline of labor's share and China's low consumption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8(11): 100-113. (in Chinese)
- 伍山林. 2011.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观模型[J]. 经济研究, 46(9): 55-68.
- Wu S L. 2011. On the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of labor share: a micro-mode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6(9): 55-68. (in Chinese)
- 伍山林, 毕鹏飞. 2025. 经济战略学缘起与中国经济战略[J]. 学术月刊, 57(5): 75-85.
- Wu S L, Bi P F. 2025. The origin of science of economic strategy and economic strategy in China[J]. *Academic Monthly*, 57(5): 75-85. (in Chinese)
- 张莉, 李捷瑜, 徐现祥. 2012. 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J]. 经济学(季刊), 11(2): 409-428.
- Zhang L, Li J Y, Xu X X. 2012. Globalization,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factor share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1(2): 409-428. (in Chinese)
- 张燕生. 1990. 贸易战略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研究[J]. 经济研究, 25(11): 69-75.
- Zhang Y S. 1990.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strate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5(11): 69-75. (in Chinese)
- 张幼文. 2015. 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特性——质疑“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J]. 学术月刊, 47(3): 74-82.
- Zhang Y W. 2015.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opening-up development model—questioning so-called “play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eaper labor”[J]. *Academic Monthly*, 47(3): 74-82. (in Chinese)
- Aghion P, Howitt P.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J]. *Econometrica*, 60(2): 323-351.
- Lucas R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 S71-S102.
- Solow R 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312-320.

Growth through Distributional Compression: Early Gains, Later Constraints, and China's Growth Model Transition

Shi'e Zhu¹ Rudai Yang²

- (1.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China's growth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high investment, weak consumption,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a marked slowdow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features reflect a strategy of growth through distributional compression: by suppressing wages and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dustrial policies increased the profit share and aggregate savings, thereby supporting investment, capital deepening, and rapid catch-up growth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s the economy approaches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however, the main engine of growth shifts from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innovation. At that stage, low wages weaken firms' incentives to innovate by reducing the returns to labor-saving technologies and by depress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market size, which makes it harder to recover the fixed costs of innovation. Growth through distributional compression is not unique to China, but a broader development pattern observed in many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To explain its stage-dependent effects, this paper develops a two-stage framework linking 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demand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ross-country evidence an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reve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labor income share,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low-wage growth model can accelerate growth in the imitation-and-catch-up phase, but becomes a constraint in the innovation-driven phase through the channel of low wages, weak consumption, limited market size, and weak innov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is model is no longer suited to China's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Future policy should shift from a supply-centered approach toward one centered more on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and demand expansion, so as to support innovation,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E25, E64